

解密南沙今昔

□书评人 王亚琪

今年以来有关岛礁争端、海洋权益的事件一直沸沸扬扬、持续不断,从4月的黄岩岛事件到中国宣布三沙市成立,再到最近的钓鱼岛登岛,国际上高度关注,国内更是民情沸腾。

主权问题,历史以来都始终是一个敏感问题,也是容易激发民族情绪和爱国主义情感的导火索。国内因此引发的民族情绪,无论是否理性,都可以想见,也可以理解。因这样那样的原因,对中国拥有这些相关岛礁主权的历史依据和法律依据,以及这些岛礁的现实状况,国内民众了解不多。中国外交一向讲究“有理有利有节”,人们看到中国外交“有节”的一面居多,如何让更多的人明白中国的“有理”,特别是如何在外交军事斗争中做到更加“有利”,社会上应有相当的渴求和期盼。

斯雄新著《南沙探秘》的出版,作为“中国第一部南沙驻兵采访实录”、“汇集《人民日报》60余年南沙史料”,也许能一定程度满足读者这方面的需求。

斯雄曾经是《人民日报》军事记者,得此便利,先后去过西沙和南沙,走遍了我驻守的所有岛礁,采访了众多的守礁官兵,用他的镜头和笔,图文并茂地展现了南沙岛礁的真实状况和守礁官兵的战斗生活。斯雄在序言中说“南沙的真实状况,让人心动,也有不安,更多的是纠结”,读罢此书,相信读者都会感同身受,心同此理。

在这些岛礁问题上,国人肯定都

认同中国有充足的历史依据和法理依据,但这些历史依据和法理依据到底有哪些?斯雄独辟蹊径,从《人民日报》自创刊以来有关南沙问题的报道入手,系统梳理后发现,《人民日报》上的新闻史料,早已权威清晰呈现了南沙问题的历史由来和与周边国家历史纷争的来龙去脉,反映我为保卫南沙做出的不懈努力和坚定斗争。特别是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人民日报》早已作了非常全面、详尽的报道,简直就是一部有关南沙问题的百科全书。

在书中,斯雄把《人民日报》有关南沙群岛的报道作了简略分类,分成五个阶段:第一阶段(1946—1959年)声明,第二阶段(1960—1979年)论战,第三阶段(1980—1989年)进驻,第四阶段(1990—1999年)搁置,第五阶段(2000—2010年)开发。广泛收集报道中的外交声明、政府文件、备忘录、白皮书等等,特别是针对周边国家的诉求进行批驳论证的文章,非常详尽,理据有力。比如“声明”阶段,针对1956年南越当局和菲律宾“狂人”对南沙群岛提出主权要求,中国政府发表的外交声明,对南沙群岛主权问题所做的充分阐述;“进驻”阶段,中国政府重点批驳了越南外交部有关西沙和南沙群岛主权的两个白皮书,以声明、备忘录和学术论证的形式,发表多篇长篇文章,如1980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由新华社1月30日播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文件《中国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主权无可争辩》,对越南外交部的白皮书逐条批驳,全文9000余字,《人民日报》在头

版开头转第3版,做了迄今为止最全面、最权威论述,此后的外交声明等内容,大都没有超出这个范围。作者认为,这些史料国内的人很多并不知道,国际上的人更不了解,很有必要重新呈现出来,不仅在国内广泛宣传,深入人心,更需要到国际上广泛传播,以正视听。

斯雄给自己的定位,首先是新闻记者,其次是游记作者,第三是文史爱好者。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南沙探秘》正好符合这三个定位。作为记者,特别是军事记者,有幸有机会去南沙,平常人没这样的机会,他很珍惜;平时因公因私,喜欢国内国外游走,写点游记,写南沙这样的题材,他很有动力和激情;关注并研究文史方面的内容,也是他平常的一个爱好,这为他研究南沙问题提供了比较好的前提。

南沙问题,涉及外交军事问题,相当敏感,即使是在媒体上做报道,也不那么容易,写成书出版,就更难。正因此,市面上有关南沙问题的公开出版物,少之又少。斯雄能把握好采访的契机,寻找到合适的切入点,并顺利通过权威部门的审定,确实不易。虽然书稿是在2010年采访整理的,正式出版时,正好赶上今年一系列有关海岛争议的热点,可谓机缘巧合,恰逢其时。

可能由于资料来源之限,以及政治外交军事上的特殊要求,《南沙探秘》一书未能更为详尽全面地展现,不能完全让读者解惑。也许等这些海岛争议进一步明朗化后,作者能把现在的“节本”修订成未来的“全本”。



《南沙探秘》
斯雄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2年5月

《中国娼妓史》虽专论“娼妓”,却不囿于“粉白黛绿,燕语莺声”,而是旨在揭示时代风气、社会组织与文化结构的种种变迁,兼及文学史与社会史的视野,也依稀可见“整理国故”运动之后,文化史写作的某种趋向。

《中国娼妓史》是本什么样的书

□书评人 卫纯

近代以来,精英阶层的思想观念逐渐突破传统界域,从而发生较大变化,“男女平等”、“女性解放”等概念开始得到认可;流连于风月场所,不再是士人风雅之举,而是“于人道主义,固属不合;于民治潮流,尤为背驰”之事。娼妓现象,渐成国人的奇耻大辱,似乎是阻碍中国步入现代文明国度的标志之一。自此,“废娼”呼声被反复力主。1928年,刚刚在形式上完成国家统一的国民政府,为顺应舆论,以首都南京为中心,在江浙等省次第开展废娼运动。但由于欠缺政治动员和社会控制能力,几年来废娼工作不力,私娼反更活跃,甚至出现警妓勾结、敲诈百姓的现象。迫于各方压力,国民政府的“废娼”态度又出现反复,在1933年1月拟定于次年实施《禁娼救济方法》,试图有限度地开放娼禁。士林闻此,一片哗然。而《中国娼妓史》就是在这背景下写作完成的。

《中国娼妓史》详细叙述了自殷商至民国的娼妓情况,以及民国以来的废娼运动,用娼妓史实说明娼妓生活的方方面面。作者把娼妓史分为五个

阶段:巫娼时代(殷商)、奴隶娼妓与官娼发生时代(先秦两汉)、家妓及奴隶娼妓并进时代(魏晋南北朝)、官妓鼎盛时代(隋至明代)、私人经营娼妓时代(清以降)。在各阶段中,作者“记述吾国历代娼妓赓续活动之体相,为有组织有统系之研究,以阐明其承演变之迹,及互相因果之关系”,对千百年来娼妓事业,持否定、批判态度,并强烈呼吁社会各界重视废娼运动。书中虽专论“娼妓”,却不囿于“粉白黛绿,燕语莺声”,而是旨在揭示时代风气、社会组织与文化结构的种种变迁,兼及文学史与社会史的视野,也依稀可见“整理国故”运动之后,文化史写作的某种趋向。本书博稽史传、引证详赡;方法近于“以诗证史”,目的立足“以史鉴今”。该书在著述方法上的侧重,可能影响到内文逻辑推断不无商榷之处;但所引史料,能参会众说,甚至不乏当时辑佚存存的前沿。其文思笔端,暗合作者“书奴”之名,可谓人如其名。

《中国娼妓史》是研究中国娼妓问题的开山之作,日后学者处理类似题目,对该书或修正、或对话,皆不能轻易绕过。但对作者“书奴”的行纪履

历,却都语焉不详,略为遗憾。作者在书中呈现出一定的中西学术视野,也常能引用学界最新成果,应非寻常的“鸳蝴”才子,“王书奴”疑为笔名。在书中,“王书奴”曾提及“参见拙著《井田制度研究》”;1933年《史地丛刊》第1期,确有题目相似、观点相同的论文,署名赵琳,但不能凭此断定二者间存在必然联系。故笔者仅以线索提出,留待学者方家探赜、指教。

《中国娼妓史》1934年11月初版于上海生活书店,1935年3月再版。1988年,上海三联对该书影印重版。1991年,该书与《中国婚姻史》、《婚姻与家族》合入上海书店“民国丛书”。依次脉络,岳麓书社于2000年出版《中国婚姻史 中国娼妓史》。2004年,团结出版社刊行单行本,并配以插图。此次三联书店重版该书,列入“三联经典文库”第一辑。在丛书“红色”出版的海洋中,这本《中国娼妓史》因其话题仿佛成为一个独特的存在。其实它体现了文化史写作的某些渊源,也表现出自己严肃性、现实性和学术性的品位。恰恰是这种气质和品位,贯穿了日后三联书店文化出版的始终。



《中国娼妓史》1934年11月初版于上海生活书店,1935年3月再版。1988年,上海三联对该书影印重版。1991年,该书与《中国婚姻史》、《婚姻与家族》合入上海书店“民国丛书”。此次三联书店重版该书,列入“三联经典文库”第一辑。图为1988年上海三联影印版。